

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之研究： 兼論鳳山縣關隘的描繪*

陳宗仁**

摘 要

大英圖書館典藏一幅清代臺灣地圖，紙本彩繪，橫幅長卷。圖中最顯著的人文景觀是縱貫臺灣南北的紅線與藍線番界，另有交通路線、府縣官署、綠營汛塘、關隘與望樓，以及原住民的番社、漢人的街庄等描繪。由於此圖缺乏圖題、圖說，有關此圖之主題、繪製年代及繪製者等問題，仍待討論。本文除了針對此一圖像進行資料介紹外，並引述相關學者對於此圖的研究與討論；在前述基礎上，依據相關文獻，探討此圖之繪製年代、敘事思維及資料來源。本文認為此圖有關臺灣南部鳳山縣土牛、關隘的描繪，反映的是 1778-1780 年（乾隆 43-45 年）時的變化，因此年代應在 1780 年或稍後。此圖之內容與敘事思維均涉及綠營武備，同一時期臺灣鎮總兵董果可能與此圖之繪製有關。另外，本圖對於鳳山縣沿山地區的描繪與蔣元樞編撰《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記載不同，本文探討其異同，並討論鳳山縣部分關隘的移徙與存廢問題。

關鍵詞：臺灣地圖、綠營、鳳山縣、土牛、關隘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大英圖書館藏乾隆臺灣輿圖的繪製年代與作者〉為題，於 2016 年 8 月 16 日中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辦之「古地圖中的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有關鳳山縣關隘的內容曾以〈大英圖書館藏乾隆中期臺灣輿圖的分析：兼論屏東關隘的描繪〉為題，於 2017 年 8 月 18 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帝國邊緣與流動：清代下淡水溪平原暨山腳、恆春半島社會秩序」工作坊發表。寫作過程感謝國興、林天人、李宗信、陳志豪等教授提供資料與建議，以及曾獻緯，助理曾明德、賴東璿協助。審查過程中，感謝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本項研究蒙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NSC 105-2410-H-001-054-MY2）補助。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通過刊登：2018 年 4 月 17 日。

- 一、前言
 - 二、內容特點的分析
 - 三、繪製年代的推斷
 - 四、敘事思維與資料來源
 - 五、鳳山縣關隘位置的討論
 - 六、結論
-

一、前言

大英圖書館典藏一幅臺灣地圖（以下簡稱本圖），紙本彩繪，橫幅長卷，寬490公分，高45公分。全圖未附圖題、圖例、方位。東方在上，西方在下，其視角是從臺灣海峽看臺灣島。圖中最顯著的人文景觀是縱貫臺灣南北的紅線與藍線番界，北起（大）屯山、南至屏東的下苦溪；另有交通路線、府縣官署、綠營汛塘、關隘、望樓（堦）、番社、街庄等名稱與描繪。

過去學界對本圖較陌生，僅見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著錄，稱之為〈臺灣前山圖〉，推測繪製年代在1731年（雍正9年）至1786年（乾隆51年）間，並謂本圖於1931年入藏大英博物館。¹ 2015年底國立故宮博物院林天人所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也收錄本圖，稱之為〈臺灣汛塘望堦圖〉，認為繪製年代在1775年（乾隆40年）至1786年間。²

由於本圖缺乏圖題、圖說，關於其主題、繪製年代、繪製者及繪製者想要表達的訊息等問題，仍待討論。本文除了針對本圖進行資料介紹外，並引述相關學者的研究與討論；在前述基礎上，依據相關文獻，探討本圖之繪製年代、敘事思維及作者。本文認為本圖有關臺灣南部鳳山縣土牛、關隘的描繪，反映的是

¹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349。

² 林天人編撰、謝國興主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文化中心，2015），頁294。

1778-1780 年（乾隆 43-45 年）時的變化，因此年代應在 1780 年或稍後。本圖之內容與敘事思維均涉及綠營武備，同一時期臺灣鎮總兵董果可能與本圖之繪製有關。另外，本圖對於鳳山縣沿山地區關隘的描繪與蔣元樞編撰《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記載略有不同，本文探討其異同，並討論鳳山縣部分關隘的移徙與存廢問題。

二、內容特點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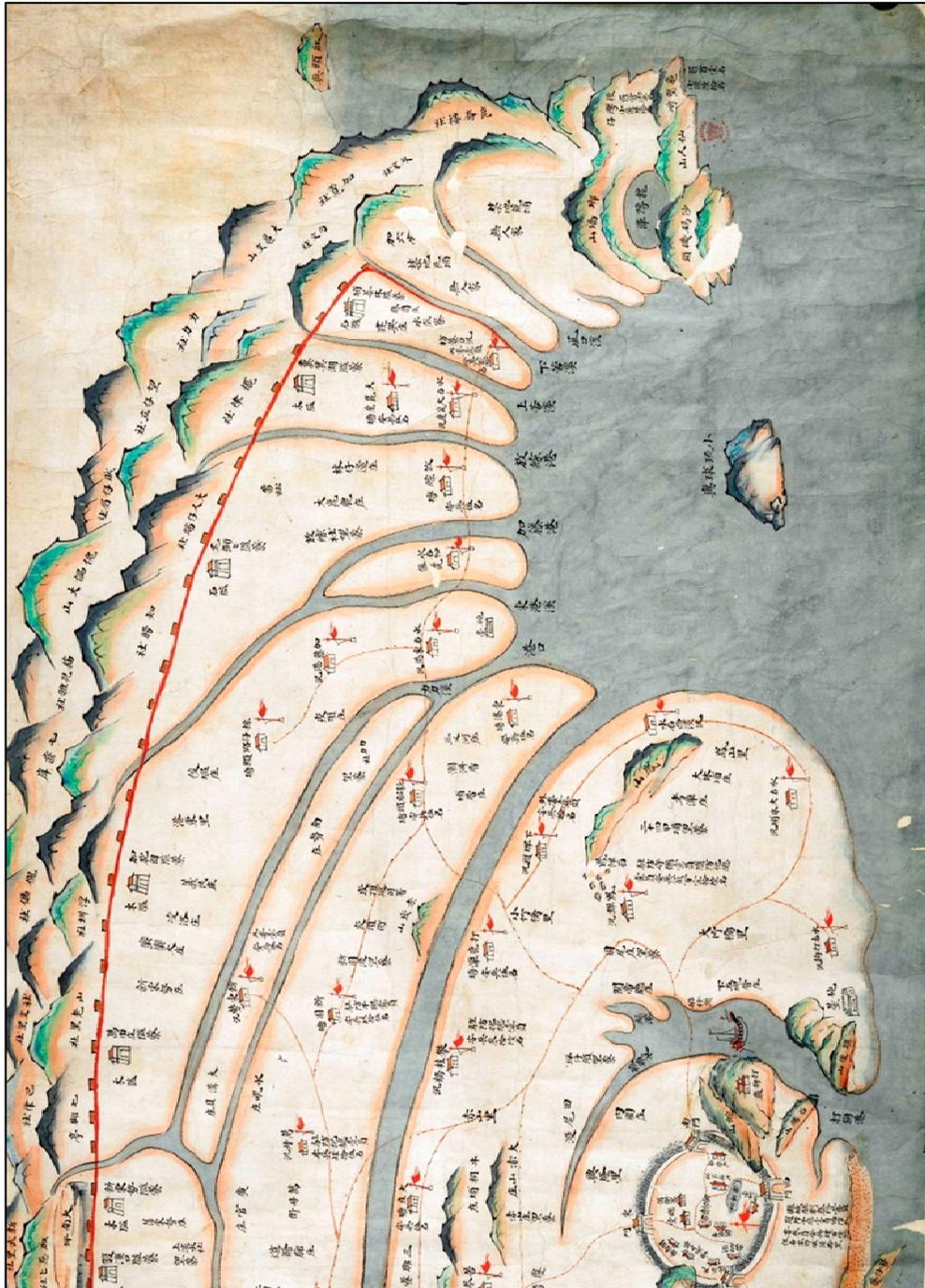
就本圖各處圖形來看，最顯著的描繪應是自然景觀，如圖幅上方層疊、綿延的山脈，圖幅中間平原地區東西向的河流，以及圖下方的海岸線。島嶼的描繪相對較少，只有四處，即臺灣島北側的雞籠島等島嶼、臺南與高雄沿海的沙洲群、屏東外海的小琉球島、以及臺灣東部的「紅頭嶼」。紅頭嶼即今之蘭嶼，位於臺東縣外海，在清代臺灣輿圖資料中，初見於 1741 年（乾隆 6 年）刊行的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之〈臺灣府總圖〉。³ 至於在臺灣輿圖中常見的澎湖群島，本圖並未描繪。

圖中人文景觀的描繪，主要有以下幾類：

1. 在臺灣沿山地區有縱貫臺灣南北的民番界址線：界址線有紅、藍兩線，此種界址源於 1740-1750 年代官方為維持沿山地區治安，保護臺灣原住民的地權，禁止漢人侵墾，於是派員清查、繪圖造冊。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臺灣民番界址圖〉（以下簡稱「〈民番界址圖〉」），即繪出此種界址線；⁴ 本圖亦繪有類似圖形，顯示兩者有淵源關係。本圖縱貫臺灣南北的紅、藍線意指線以東為原住民區域，禁止漢人越界。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南部之

³ 劉良璧纂輯、楊永彬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54。

⁴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之圖，原稱〈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杜正勝訂名為〈臺灣民番界址圖〉。參見杜正勝，《臺灣民番界址圖說略》（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2017 年陳志豪撰文討論收藏於中國蘭州之圖，該圖亦與中研院所藏之民番界址圖類似。關於乾隆時期臺灣番界圖的變遷，可參見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22: 3（2015 年 9 月），頁 1-50；陳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查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24: 4（2017 年 12 月），頁 1-33。



圖一 本圖屏東地區局部

圖片來源：林天人編撰、謝國興主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頁307。

紅線最南一段繪有數十個長方形小色塊（參見圖一），沿著紅線並列，其範圍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上游的尖山以南至下苦溪，屬鳳山縣境，此種色塊應指乾隆時期官員所稱的「土牛」。關於鳳山縣土牛的興築涉及本圖繪製年代的考訂，詳見下節討論。

2. 臺灣南部沿山地區的隘寨建築：本圖在臺灣沿山地區番界附近描繪甚多隘寨，多半僅標注名稱，無圖形表示，惟獨鳳山縣境十座隘寨加繪圖形，且在其旁標注建築之材質，如「石隘」、「木隘」等。關於鳳山縣隘寨之設置涉及本圖繪製年代的考訂，詳見下節討論。

3. 道路線：本圖繪有土黃色線條，線條上再疊繪黑色虛線，遍布圖幅各處，應指道路線；但這些線條連繫的多半是官方的綠營塘汛，而非民庄保里，這是本圖特點，即本圖與軍事有關。

4. 府縣城：當時臺灣府下轄四縣二廳，本圖未繪澎湖廳，其餘各府、縣、廳均繪出城牆、城門，但臺灣府與鳳山縣城內則增繪文武官署與寺廟，此種著重臺灣南部府縣城的描繪，亦是值得注意的訊息。

5. 房屋與旗桿、紅色旗幟：這些圖形標示該處是營、汛、塘或巡檢司所在。這種軍事據點的描繪方式常見於清朝時期之地圖。

另外，臺灣最北部的大雞籠有城堡一座，臺南安平亦有城堡一座，頗為特殊，是十七世紀西班牙王國、荷蘭東印度公司先後興建、駐防的西式城堡，十八世紀清朝繪製的臺灣地圖常見此種描繪。

根據上文的討論，本圖最顯著的圖形是縱貫臺灣南北的番界線與道路線，至於圖形數量則以標注營、汛、塘及巡檢司所在的房屋與旗桿、旗幟最多，而民間的村社地名只以文字標注。這種現象說明本圖著重繪製遍布臺灣府各地的軍事據點，以及據點彼此間的道路線連繫。此外，本圖也重視臺灣南部沿山地區的描繪。

再就本圖之文字標注來看，以下按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分別而論。

自然景觀，以臺灣南部為例：

1. 山名：傀儡大山、尖山……
2. 溪名：力力溪、硫磺水、上苦溪……
3. 港名：萬丹港、打狗港、加籐港……

人文景觀，以臺灣南部為例：

1. 官署名：(鳳山)縣堂、南路營署……
2. 寺廟名：關帝廟、天后宮、大道公宮……
3. 營、汛、塘、巡檢司名：山豬毛淡水營、阿里港汛、蘭波嶺塘……
4. 隘寮名：萬巾庄隘寮、新東勢隘寮、雙溪口隘寮……
5. 望寮名：赤山庄望寮、半屏山望寮、橫山仔望寮……
6. 街庄保里名：興隆里、大赤山庄、觀音山里……
7. 地名：上五塊厝、枋寮、船仔頭……

本圖標注之文字除了上述各種名稱外，亦具說明功能。文字說明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說明各地營、汛、塘的兵員與相對距離，如：

1. 大雞籠汛，離艋舺營柒拾里。
2. 金包里汛，至大雞籠汛肆拾里。

3. 山豬毛淡水營，駐劄都司壹員、把總壹員、額外外委壹員，安兵捌拾陸名。但各地有關此類說明文字的體例並不一致，有些地方只注明相關距離而無兵員數，或有兵員數而未載距離。

另一類是標注縣界，如鳳山縣與臺灣縣以二層行溪（今二仁溪）、下淡水溪為界，故在溪流兩旁標注「鳳山縣管轄」、「臺灣縣管轄」，以及「臺邑界」、「鳳邑界」。

本圖有關文字的運用與圖形的描繪重點相同，亦即自然景觀的說明著重山脈與溪流；人文景觀著重官署與營汛，顯示本圖主要呈現官方關注的地理訊息，特別是軍事布防情形，故《方輿搜覽》的編者收錄本圖時，訂定名為「臺灣汛塘望寮圖」，即是為了反映這一繪圖重點。

本圖係紙本彩繪，其繪製順序為先以黑色筆墨勾勒各種景物的線條，如河流、山丘、房屋、番界等；再施加色彩，如番界用紅、藍色，屋瓦用土黃色，河流為藍色，旗幟為紅色等；最後標上文字，如地名、官署名、各種說明文字等。全圖完成後，又有貼黃，貼於汛塘說明文字之下方或附近，有些紙條已脫落，仍可見殘跡。

依據上述內容分析，筆者認為本圖不宜稱為〈臺灣前山圖〉，因繪製者應是

想畫一幅臺灣地圖，而非僅是前山圖；亦不宜僅稱為〈臺灣汛塘望蔡圖〉，因圖中描繪的主題應是全臺形勢與武備。

三、繪製年代的推斷

關於本圖之繪製年代，⁵ 李孝聰推測年代在 1731-1786 年間，林天人認為年代在 1775-1786 年間。由於林爽文事件平定後，諸羅縣於 1787 年（乾隆 52 年）改稱嘉義縣，但本圖標注為諸羅縣，故前述兩位教授均認為 1786 年是繪製的年代下限。蘇峯楠則認為本圖約成於 1781-1784 年（乾隆 46-49 年）間，尤其可能在 1781-1782 年左右。⁶

關於年代上限，林天人注意到本圖中臺灣府城有一小西門，此乃 1775 年（乾隆 40 年）臺灣知府蔣元樞重修臺灣府城時新設，故本圖年代應在此年之後。不過，臺灣知府蔣元樞除了新建小西門外，在城外之軍工廠亦添建一城門，稱為「廠門」；又新建接官亭之石坊。這些設施均繪於本圖中，亦見於蔣元樞編纂之《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參見圖二）。其中兩座城門（小西門、廠門）修於 1775 年，接官亭石坊則建於 1777 年（乾隆 42 年）。⁷ 故本圖繪製時間應在 1777 年之後。

上文提及本圖中臺灣南部隘蔡畫法與臺灣中北部不同，除了畫出圖形，又加注「石隘」、「木隘」等字；同樣的，臺灣南部之番界線亦加繪土牛。何以本圖繪者著重描繪臺灣南部的隘蔡與土牛？此一現象應與繪圖之時，當地之隘蔡與土牛設施興建完成，故特地描繪。因此，臺灣南部隘蔡與土牛的整建工程應與本圖之繪製時間相關。

清朝官方在臺灣設置隘蔡與土牛設施均與臺灣的邊防政策有關，官方基於治安考量，希望隔離漢人與山區原住民。早在 1720 年代，官方在臺灣沿山地區推

⁵ 明清時期，地圖的繪製可能存在多次的繪本，如繪製過程中的稿本、完稿後的清稿本、傳抄本。史料有限，筆者無法判斷本文之圖究屬稿本或他人抄本，本文所指「繪製年代」係指圖幅內容呈現的年代。

⁶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37。因該論文主題所限，蘇氏未細說其推論之依據。

⁷ 謝金鑾、鄭兼才纂，薛志亮修，《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140 種，1962；1807 年原刊），頁 90 載：「接官亭在西門外海口風神廟前（乾隆四年，巡道郭善建。四十二年郡守蔣元樞捐俸修；並於左側構官廳，於海口砌石為埭，加坊表焉）」。



圖二 本圖臺灣府城局部

圖片來源：林天人編撰、謝國興主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頁304。

動立石畫界政策。畫界之後，又施行各種措施，希望維持此一界線的有效性，如多次清釐界址、豎石立碑，進而開挖深溝、堆築土牛。又先後頒行各種禁止越渡的律例，最初是懲治違犯的民、番偷渡者，後來罰則擴及管理界址的文武官員。⁸

⁸ 本節有關清朝邊防政策的討論，可參見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1），頁 87-107；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

當官方努力畫清界址、訂定罰則，卻發現成效有限，進一步的政策作為就是派出夠多的執法者，確保界址的有效性。最初是重用綠營，但兵額有限，故引進民間武力，隘制即是在這樣的政策脈絡中逐漸成形，即在所謂「生番」出入隘口設置關隘，由歸化的原住民（熟番）或漢人駐紮、稽查，防止私越。

1740年代官方著力整頓番界，透過原住民的土目、通事，派撥熟番到隘口巡防。1754年（乾隆19年）以後，巡防逐漸變為定點守禦，即設立關隘，在1760年（乾隆25年）以前，彰化、淡水、鳳山等縣廳均已設隘。而同一時期，亦在彰化、淡水兩廳縣番界堆築土牛。據記載，部分地區每座土牛與土牛溝的規模為「長貳丈，底闊壹丈，高捌尺，頂闊陸尺。每溝長壹拾伍丈，闊壹丈貳尺，深陸尺。永禁民人逾越私墾」。⁹ 惟當時鳳山縣並未堆築土牛。

約十餘年後，到了1770年代至1780年代初，臺灣官方整頓鳳山縣的關隘，並增建土牛，本圖對於鳳山縣的隘寨與土牛加意描繪，即是敘述此一時期之變革。

以下先論隘寨的整建。此事亦與當時臺灣知府蔣元樞有關。蔣元樞在臺任職期間（1774年〔乾隆39年〕底至1778年〔乾隆43年〕中）推動多項整建工程，包含前述臺灣府之城工、橋梁、鹽場、官署等，亦重新整建鳳山縣的隘寨。¹⁰ 對於這項整建工程，蔣元樞繪圖記其事，並寫作〈鼎建傀儡生番隘寨圖說〉，其文謂：

臺灣南北二路各有生番。北路地廣山深，番離庄遠，又設土牛、隘口，層層巡警，歷年安靜。南路之傀儡生番最稱兇狠，且沿山居民逼近番界，約計二百餘庄。從前限以山根溪溝為界，雖設武洛、新東勢、山豬毛、枋寮口、糞箕湖、巴陽庄等六隘，撥番分住巡守；但所撥之番為數無多，又無隘寨居住，其勢自不能常川守衛。且今昔情形不同，前此生番出沒之處，今則番跡罕到；前者從未出沒之區，今則有路可通，如雙溪口、大路關、毒口溪等處是也。

情形異昔，法宜變通。元樞前巡南路，細察情形，殊失扼要，現雖生番安

學研究所，2001），頁41-58、149-196；李文良，〈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國史館館刊》（臺北）52（2017年6月），頁9-20。惟本文所述，係依據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22:2（2015年6月），頁8-27。

⁹ 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典藏古碑拓本·臺灣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5），頁258-259。

¹⁰ 陳宗仁，〈《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內容解析〉，收於華林甫、陸文寶主編，《清史地理研究：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308-310。

靜，萬一遇有越界之事，脩禦宜周。因就山腳遍勘，於生番出沒之處，添建隘寨，酌移舊隘，添撥番丁連眷同住，永資捍衛。稟蒙大憲批允辦理，隨經示諭，衿民樂從，捐銀輸料，爭先恐後。謹委專員會同營弁，慎選董事，督同興建……¹¹

此文首段敘述從前鳳山縣設隘緣由與缺失，謂沿山地區生番兇狠而民居逼近番界，曾設六隘，派番巡守，但為數無多，又不能常駐守衛。次段敘述蔣元樞整建新舊關隘緣由，即今昔情形不同，「法宜變通」，於是「添建隘寨，酌移舊隘」。原先設置六座隘寨，新增為 10 座。除了整建關隘外，又設置「通事寨」，即在「隘寨之後，另建寨房六所」、「以木為柵」，「令生番通事攜帶壯丁守禦，與熟番互為聲援」。文中謂「大憲批允辦理」，大憲應指當時閩浙總督鐘音（任職期間為 1771 年〔乾隆 36 年〕至 1778 年）。

在蔣元樞所繪〈鼎建傀儡生番隘寨圖〉中，共繪十座隘寨，其中 4 座隘寨的圍牆為土黃色，其他為灰色，此種描繪方式與本文所論之圖相比，可知土黃色圍牆指木隘，灰色圍牆指石隘。¹² 另外，隘寨之東方，有 6 處樹立木柵的「通事寨」。本文所論之圖反映了蔣元樞對於鳳山縣關隘的整建內容。

1778 年 3 月（乾隆 43 年 2 月），巡臺御史覺羅圖思義與孟邵在奏摺中報告巡視臺灣南路所見，謂：

惟查鳳屬之山豬毛等處沿山居民，約計二百餘庄，俱與傀儡山生番逼近。從前設有隘寨六座，派撥熟番巡守……據臺灣府知府蔣元樞詳明總督鐘音，會同鎮、道，議于庄後山腳各生番出沒之所添建隘寨，並將舊有隘寨籌酌改移，其圍牆或用石砌、或用木柵，前後共建隘寨十六座。仍按地勢之險夷，酌派守番之多寡，俱飭令該丁挈眷同住，並撥給就近無礙埔地，令守隘番丁墾種，俾資衣食以堅防守之心。各庄民等均極同聲稱便。¹³

¹¹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3），頁 30-31。

¹² 屏東各隘的材質有木隘和石隘的不同，因筆者所見史料有限，其原因不詳。由於木隘共有 4 座，其中兩座為舊隘（即新東勢及箕箕湖隘），另兩座為新設（萬中庄隘寨、加匏朗隘），故無法斷定木隘是否係延續舊隘規制。

¹³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該院，1982），第 42 冊，頁 64-66。

巡臺御史覺羅圖思義與孟邵於本年 2 月巡視南路，次月上呈此一奏摺，摺中提及鳳山縣添建與改移隘寨，並謂隘寨圍牆或用石砌、或用木柵，而庄民「同聲稱便」。依據此摺寫作之年代可知，蔣元樞對於鳳山縣隘寨之規畫與營造，必在 1778 年 2 月御史巡視南路之前。不過巡臺御史的奏摺中稱「前後共建隘寨十六座」，指的是十座由熟番駐守的關隘和六處漢人壯丁守禦的通事寨。

在此摺中亦提到鳳山縣修築土牛的起因，其文謂：

伏查臺屬北路番界向俱勘築土牛，挑挖深溝，俾民番共知遵守。臣等悉心酌議，即飭令地方官仿照北路，一體築牛、挑溝，使界址犁然，一望可知，庶民、番各有界限，兵、役不難稽查。¹⁴

蔣元樞在〈鼎建傀儡生番隘寨圖說〉亦有類似記載，謂：

前巡憲視歷南路，勘查番界，蒙以元樞籌建隘寨、望樓各事合於機宜，可資扼要，論以「從前雖以山根溪溝為界，但山形起伏不一，水溝衝徙無常，日久恐有混淆，應照北路規制，建立土牛，俾民番永遵。業已附摺入奏，務須妥速辦理，兼荷仰述聖諭，以釐定番界為第一要務」。元樞遵即嚴督鳳邑李令，妥速趕辦，以期上遵聖訓、下惠黎元。自今以後，界址永清，無虞淆混；該番畏守禦之日嚴，自必益臻寧謐，沿山黎庶永慶昇平矣。¹⁵

「巡憲」指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在蔣元樞任職臺灣知府期間，僅有前述覺羅圖思義與孟邵來臺。他們於 1777 年（乾隆 42 年）年中奉旨，9 月抵臺，年底巡視臺灣北路，隔年 2 月巡視南路。故蔣元樞文中所謂「前巡憲視歷南路」，即指覺羅圖思義與孟邵兩人於 1778 年 2 月（乾隆 43 年正月）巡視南路之事。所謂「附摺入奏」之摺，即指前述之奏摺，上奏日期是同年 3 月 6 日。當時巡臺御史對於蔣元樞籌建鳳山縣之隘寨、望樓，認為「合於機宜，可資扼要」，但指示南路番界「應照北路規制，建立土牛」，此乃鳳山縣挑挖土溝、修築土牛之起因。

蔣元樞奉巡臺御史指示後，即「嚴督鳳邑李令，妥速趕辦」。李令即鳳山知

¹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42 冊，頁 64-66。

¹⁵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31。

縣李桐。¹⁶ 不過巡臺御史上摺後，隨即離臺，蔣元樞亦於次月（4月）任職屆滿，¹⁷ 返回福建，等待引見。故鳳山縣堆築土牛之事應由繼任的臺灣府知府萬齡前督導，他於1778年6月到任。¹⁸

1781年2月（乾隆46年2月），閩浙總督富勒渾以「臺郡南路建築隘柵等項工竣」，恭摺奏聞，其文謂：

鳳山縣轄之山豬毛等處，沿山居民約計二百餘庄，俱與傀儡山生番逼近，……茲據臺灣府知府萬綿〔絲〕前將應行添建、改設各隘寨、木柵共十六處，同應築土牛八十一座，及挖挑寬深溪溝，督飭各委員趕辦完竣，業已撥番分住，給地墾種。並據臺灣道俞成、臺灣鎮臣董果會同查勘添建隘寨、木柵及挑築深溝、土牛，實屬堅固深通，由福建布政使德文會同按察使楊廷樞詳請奏前來。臣覆查無異，除仍飭該鎮、道每年農隙時委員確勘，隨時修理，以期經久守禦……。¹⁹

摺中謂鳳山縣隘寨與土牛工程均已完竣。其中隘寨謂有十六座，不過本圖僅見10處隘寨，未見另6座通事寨。又有土牛81座，即本圖在番界上描繪的長形色塊。

1781年2月閩浙總督富勒渾恭摺上奏之時，鳳山縣隘寨與土牛整建工程業已完成。由於工程完竣後，臺灣道俞成、臺灣鎮董果曾會同查勘，又由福建布政使德文會同按察使楊廷樞上呈詳文，故扣除官員覆查、公文移轉等時間，實際工程或可推斷已於前一年（1780、乾隆45年）完成。另外，奏摺中董果尚為臺灣鎮總兵，而董果於1780年7月（乾隆45年6月）奉調為海壇鎮總兵，²⁰ 故土牛工程應於1780年上半年完成。因此，本文所論之圖若是描繪已完工的鳳山縣隘寨

¹⁶ 李桐於1776年2月（乾隆40年12月）調署鳳山縣知縣，1779年2月（乾隆44年1月）「因命案相驗不實，經臣等會摺參奏，請旨革職」。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63冊，頁142-144。李桐革職後，由上杭知縣韓燕調補，鳳山縣之關隘與土牛建設工程係在此二人任內進行並完工。

¹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64冊，頁373。

¹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66冊，頁406。到任日期為乾隆43年6月2日，即1778年6月25日。

¹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66冊，頁352-356。

²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30冊，頁141-142。1780年7月23日（乾隆45年6月22日）奉諭旨董果調補新職，福建官方收到諭旨應於7-8月之際，董果應於8-9月間離職。

與土牛整建工程，則繪圖時間應在 1780 年或此年稍後。

四、敘事思維與資料來源

在前述兩節的討論中可以發現，本文所論之圖著力描寫臺灣的軍事武備，如遍處臺灣各地的綠營汛塘、縣廳巡檢司、隘寨、望寨（望樓）等，也描繪臺灣知府蔣元樞興修的某些工程，如臺灣府城工、鳳山縣的隘寨整建與土牛新築。上述內容為何描繪在一幅臺灣地圖中？有誰會想要繪製此種內容之地圖？這類地圖應是某一層級的官員令繪師製作的成果。繪師只是憑藉其繪畫技術受命繪圖，至於地圖的形式、內容仍是由委託人——即官員決定，且地圖之各種地理訊息亦由官方提供，因此本文所謂的「繪製者」或「作者」指的是主導繪製此種地圖的人。

上文提到本圖多為軍事地理訊息，例如圖中道路線連結的端點多為塘、汛、營及府縣城，而非民間的街庄。以下探討汛塘的描述與文字說明，筆者認為分析汛塘描繪格式的差異與特色，可以明瞭本圖之敘事思維與資料來源。

（一）塘、汛、營標注格式的差異

全圖主要說明文字是記載各塘、汛、營及縣城的駐軍數與相對距離，但說明的格式並不一致。可區分出以下三類：

1. 僅記汛塘之相對距離，但不記兵員數：在諸羅縣、彰化縣及淡水廳境內，如諸羅縣南港塘，其旁載：「至笨港汛參里」；彰化縣之南北投汛，其旁載：「至縣城參拾里」；淡水廳之海山口汛，其旁載：「至艋舺營壹合伍里」。惟諸羅縣八掌溪以南至臺灣縣界，出現一些例外，如龜仔塘載「安兵伍名，至府陸拾里」、溪墘塘載「安兵伍名，至府參拾里」、加溜灣汛載「把總壹員、安兵貳拾陸名、至府參拾里」；另下加冬汛寫作「下加冬大汛」。
2. 兼記武官數、駐軍數與相對距離：臺灣縣境內與鳳山縣境二濫溪（今阿公店溪）以北之汛塘，如大目降汛，其旁載：「外委壹員、安兵貳拾捌名、至府貳拾里」。
3. 僅記武官數與駐軍數，不記距離：鳳山縣二濫溪以南，如東港塘僅載：「安

兵伍名」；枋寮口汛載：「外委壹、安兵貳拾名」。但境內標注「水右」的汛則未載武官數與駐軍數。

上述格式的差異與縣廳轄域不符，如諸羅縣境以八掌溪為界、鳳山縣境以二濫溪為界，南北兩側之記載格式不同，此種現象應是受到綠營營制的影響。十八世紀下半葉臺灣鎮轄下，除水師之外，陸路營及其長官駐防地如下：

1. 臺灣鎮標中、左、右三營，均駐防臺灣府城。
2. 臺灣城守營左、右二軍，參將駐防府城、左軍守備駐防岡山汛、右軍守備駐防下加冬汛。
3. 南路營，參將駐防鳳山縣城，都司駐防下淡水（亦稱下淡水營）。
4. 北路協標中、左、右三營，副將、中軍都司駐防彰化縣城、左營守備駐防諸羅縣城，右營守備駐防竹塹。
5. 淡水營，都司駐防艋舺渡頭。²¹

前述格式的不同，應與各營駐防區域的畫分有關。

1. 諸羅縣八掌溪以北，以及彰化、竹塹兩縣與淡水廳等區域，分屬北路協標中、左、右三營及淡水營。這四營之汛塘標注文字相同，屬前述格式的第一類，即標注各汛塘至某地多少里，但不記兵員數。
2. 諸羅縣八掌溪以南，以及臺灣縣北側（府城以北）等區域，屬臺灣城守營右軍。此區域標注格式屬第二類，但諸羅縣境八掌溪以南，出現第一類與第二類格式摻雜的現象。
3. 臺灣縣南側（府城以南）、鳳山縣境二濫溪以北等區域，屬臺灣城守營左軍守防。此區域標注格式屬第二類，兼記里數、兵員數。
4. 鳳山縣境二濫溪以南分屬南路營、下淡水營管轄，汛塘標注格式屬第三類，即不記里數。

根據上述討論，除了臺灣城守營右軍守防區域的標注文字較分歧，其餘區域的標注文字格式均與各區域營制相關。此一現象顯示格式的不同可能與資料來源有關，即臺灣陸路各營之資料在彙整、上呈時，各營使用的格式不同，本圖繪製

²¹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文叢第121種，1962；1774年原刊），頁367-370。此處引用余文儀纂修之《續修臺灣府志》，因該志纂修於1760年代，是距本圖繪製時間最近的府志。

人員只是按各營資料填入，導致全圖汛塘文字出現區域差異的現象。

再就各汛塘標注文字的性質而言，武官數、駐軍數，屬「營制」資料，相對距離屬「程途里數」資料，這些資料都是綠營文書常見的記載內容。如現存《臺灣兵備手抄》，其內容與 1870 年代臺灣鎮總兵林宜華有關，可能是他任職時使用的文件，其中有〈臺灣南路汛塘尖宿里站〉、〈艋舺營所轄地方洋面程途里數〉等資料，即是記載各汛塘距離與兵員數；²² 又如《臺灣府輿圖纂要》在〈營制〉或〈防汛〉條目下亦收錄此類資料。²³ 這兩種雖然是十九世紀的檔案資料，但十八世紀時亦應有類似之文獻。

（二）僅見水師右營的標注

在本圖中，鳳山縣沿海從北往南標注「水右蟻港汛」、「水右萬丹汛」、「水右打狗汛」……等文字，「水右」指安平水師協標右營。其中「水右蟻港汛」臨近二濫溪，此溪以北未見類似的標注文字。對全圖汛塘標注文字而言，這又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安平水師協標隸屬臺灣鎮統領，水師下轄中、左、右三營，各營有駐防、分防、分巡之責，其中水師右營守防「蟻港汛」及其以南水域。在本圖中，僅見「水右」諸水汛的標注，而未見其他二營的標注。²⁴

由於安平水師右營轄區在二濫溪以南水域，而南路營守防範圍亦是二濫溪以南的鳳山縣境，因此水汛資料可能是南路營提供，才會出現本圖僅見水師右營之駐防資料。

（三）汛塘相對距離的描寫具方向性

本圖各汛塘標注相對距離，如至某地幾里，其寫法並非同質性地描寫某一汛塘與相鄰單位的距離，而是描寫其與上級單位的距離。

²²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兵備手抄》（文叢第 222 種，1966），頁 13-22。

²³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府輿圖纂要》（文叢第 181 種，1963），頁 55-62、110-113、147-149 等。

²⁴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1962；1764 年原刊），頁 197 載：「按舊時安平鎮隸縣轄，凡水師三營雖汛分南北，皆縣防海所必詳也。自雍正九年安平改隸，今分右營弁兵散置各汛口中，制與昔異，應就近制」。按此志編纂於 1760 年代初，故所謂「今分右營弁兵散置各汛」，乃此一時期之事，而據其書同頁記載：「蟻港汛：縣西北二十里，北接臺灣縣鯤身頭汛，水程二十里，次衝，目兵五名分防」，故知 1760 年代時蟻港汛乃鳳山縣最北界之水汛，本圖所載與之相同。

以臺灣北部之淡水廳為例，共有十四條相關距離的記載，可以分類如下：

1.淡水營

淡水營：至竹塹壹百里

2.雞籠港區域

金包里汛：至大雞籠汛肆拾里 大雞籠汛：離艋舺營柒拾里

3.臺北盆地區域（淡水港區域）

砲臺汛：至小雞籠汛壹拾里 小雞籠汛：至艋舺營汛柒拾里

貓兒錫口：至艋舺營汛壹拾里

尖山：至霄里汛壹拾里

霄里汛：至海山口汛貳拾柒里

大安寮：至海山口汛壹拾里 海山口汛：至艋舺營壹拾伍里

上述汛、塘里數之敘述方式有兩種，一是某塘、汛至某汛幾里；另一是某汛至淡水營幾里；至於淡水營則載至竹塹（淡水廳城、北路協標右營駐防於此）幾里。這種敘述方式並非單純地描述相對距離，而是呈現等級與隸屬關係；亦即讀圖者在閱覽時，即可得知淡水營各汛、塘的位置、連絡道路、及隸屬關係等軍事訊息。這種現象不僅見於淡水營，亦見於彰化、諸羅及臺灣等縣所在的綠營。

再以臺灣中部之笨港汛為例，此汛屬臺灣北路協標左營管轄，依本圖所載，以下五塘之距離說明與笨港汛有關：

白沙墩塘：至笨港壹拾里。

北港塘：至笨港汛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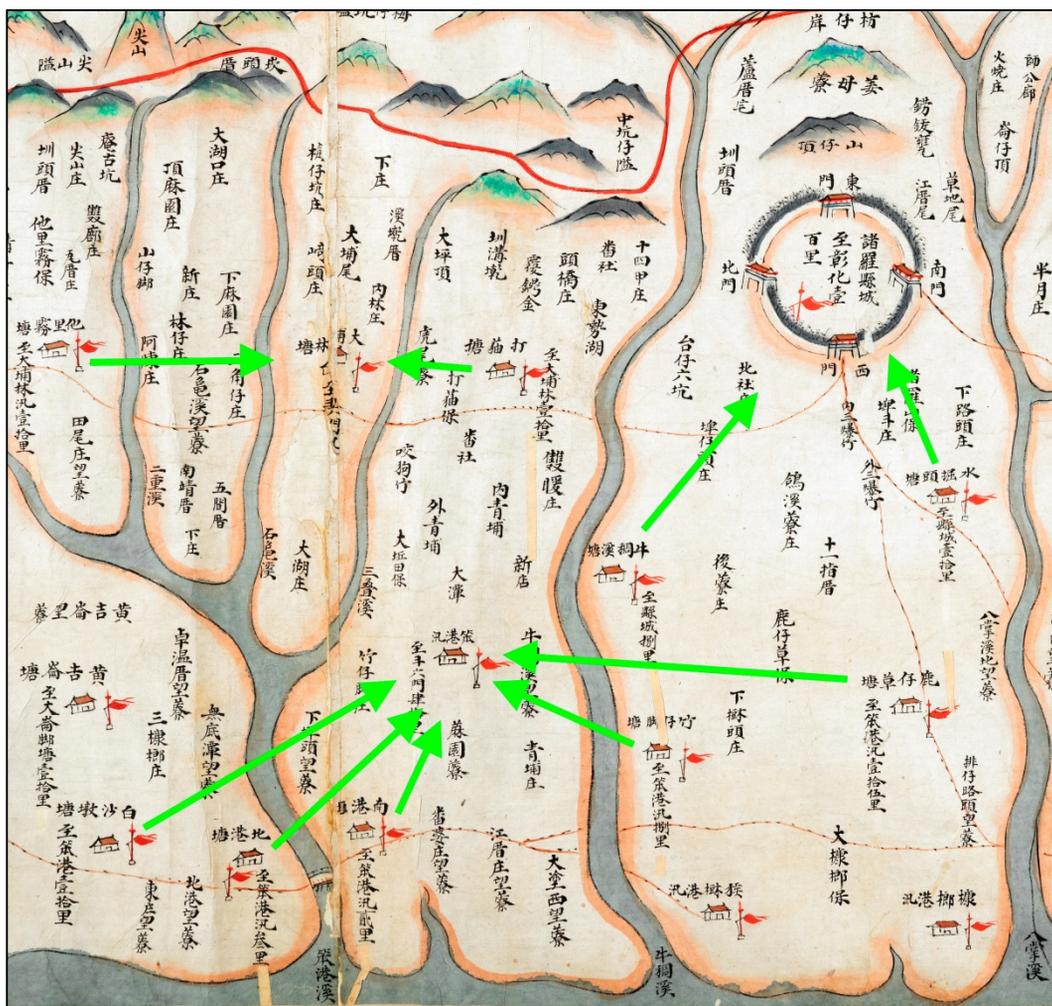
南港塘：至笨港汛貳里。

竹仔腳塘：至笨港汛捌里。

鹿仔草塘：至笨港汛壹拾伍里。

其中竹仔腳塘、鹿仔草塘均在牛稠溪之南，鄰近猴樹港汛，但卻隸屬溪北之笨港汛，這是因猴樹港汛屬安平水師協標左營防守，屬水師營系統；而笨港汛則由臺灣北路協標左營千總駐割，兵員 150 名。²⁵ 前述白沙墩等五塘之兵員應由笨港汛派出，屬陸路營系統，故各塘均記載至笨港汛之距離。據圖四之汛塘隸屬關

²⁵ 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 74 種，1961；1741 年原刊），頁 320。



圖四 本圖雲林、嘉義地區汛塘隸屬圖

圖片來源：底圖為本圖雲林、嘉義地區局部，筆者加繪線條。

係，可知笨港汛及其所轄各塘位置均靠海，其東側靠內陸之塘則以牛稠溪為界，分別歸屬大埔林汛（圖中寫作塘）與諸羅縣城之北路協標左營。

（四）貼黃的位置與作用

本圖關於汛塘記載有另一特殊處，即除了南路營與下淡水營外，其餘各營汛塘記載距離之文字下方通常都有貼黃。有學者認為貼黃出現於「全臺沿海汛塘、

彰化縣內陸之汛塘，以及彰化縣城、番仔溝、大里杙庄等非汛塘地點處」，推測可能是 1782 年「臺灣鎮總兵金蟾桂至彰化縣城處理漳泉械鬥事件，以及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討論加強沿海邊防等過程裡，取用本圖討論所留下的痕跡」。²⁶ 不過細看本圖，貼黃的數量相當多，不僅出現於彰化縣或沿海汛塘，亦見於淡水廳、諸羅縣及臺灣縣的內陸汛塘。

圖中出現多處貼黃，必有貼者的用意，但應不是為了處理彰化動亂而貼。亦不可能與全臺動亂有關，如林爽文事件。因為與戰事有關的地圖，通常需要以更大的比例尺繪製；且林爽文事件發生時，鳳山縣亦有動亂，但本圖該處並無貼黃。關於本圖的貼黃，筆者認為有三個面向值得考慮：

1. 依據目前尚存於圖上之紙條而言，可以確定是在繪製完成後才貼，且現存紙條未書寫文字；其原因或許是原本要書寫文字，但因故未寫，或者只是貼上以標注位置而已，但均像是在籌畫某種事宜。

2. 貼黃未見於南路營與下淡水營，似可推斷貼黃與北路綠營有關。

3. 貼黃出現於標示營、汛、塘相對距離之處，也許是為了更新汛塘距離資料，或是讓閱圖者容易找到汛塘距離資料。

因此，本圖之貼黃可能是作為官員（如臺灣鎮總兵）出巡北路之參考或與規畫北路綠營汛塘事務有關。

根據上述分析，本圖不僅描繪軍事地理訊息，圖中道路線的描繪、汛塘的標注格式及描述的方向性，更顯示這些地理訊息是來自武職官員，反映的是這類官員的需求與思維；另外，標注格式的區域差異及其與陸路各營的相關性，顯示圖中汛塘資料亦是由武職官員彙整、呈報。因此，本圖之繪製應與武職官員有關。

清代臺灣官方可以分為文、武兩個系統，文職長官主要是分巡臺灣道與臺灣知府，武職則是臺灣鎮總兵；兩者之上司分別是福建巡撫與福建水師提督，但最終是由閩浙總督統領。由於此幅圖強調軍事地理訊息，且涉及全臺，因此可能的作者應是臺灣鎮總兵，因為福建水師提督、閩浙總督或巡臺御史所用的臺灣地圖應是臺灣在地官員所提供。

²⁶ 此乃蘇峯楠之看法，在其正式發表之論文，謂本圖約成於 1781-1784 年間，尤其可能在 1781-1782 年左右，即受此看法影響。參見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37。

臺灣鎮總兵為正二品，1733年（雍正11年）改為掛印總兵，遇事可以單獨上奏摺而不須督撫轉奏，為閩浙總督轄下水師最要缺，也是乾隆中期臺灣文武官員唯一擁有此權力的官員。²⁷ 1780年浙江巡撫李質穎討論新任臺灣總兵赴臺事宜時，亦謂：「臺灣為海外要道，總兵係專閩大員，海疆重鎮甚為緊要」。道光年間臺灣道姚瑩謂臺灣鎮總兵的地位與重要性：「臺灣總兵，初皆以提督之有功爵者為之，道職較小，故列銜其後。嗣是，總兵非功爵之提督，亦相沿而不改。……蓋臺鎮兵額為天下最，又專制海外」。²⁸ 所謂兵額為天下最，是指臺灣府置一鎮總兵，統轄兵額一萬餘名，清朝各府皆無如此之編制。臺灣鎮掛印總兵統轄兵員既多，且又專制海外，是當時管轄臺灣島的最主要官員。

本文之圖描繪重點是臺灣武備，而與臺灣武備最密切相關的官員是臺灣鎮總兵。前節探討本圖繪製年代，認為本圖顯示的內容與臺灣知府蔣元樞任內建設有關，年代應在1780年以後，但不會晚於1787年初（乾隆51年底）林爽文事件爆發時。在此期間，據《續修臺灣縣志》載，臺灣鎮總兵共有以下數位：

董果，直隸人，武進士，乾隆42年5月任。

張繼勳，羅源人，行伍，乾隆45年11月任，水師總兵。

鄭瑞，臺協副將，乾隆47年5月署。

金蟾桂，江南人，武進士，乾隆47年9月任，以議去，水師總兵。

孫猛，鑲白旗人，世襲，乾隆47年12月任，卒於官。

柴大紀，浙江人，武進士，乾隆48年9月任，51年晉京，仍回本任。旋遭逆擾，軍功，加巴圖魯水師提督、參贊大臣義勇伯。後以議去。

陸廷柱。乾隆51年3月任。尋調回。²⁹

其中鄭瑞為署理，金蟾桂、孫猛及陸廷柱在任時間均僅數月，董果、張繼勳、柴大紀等三人可能性較大，而又以董果最可能與本圖有關。

在董果的奏摺與後人所寫的傳記中亦提及董果曾使用與擁有臺灣地圖。例如董果於1777年任臺灣鎮總兵，該年巡視臺灣各地，自謂：

²⁷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59。

²⁸ 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溟奏稿》（文叢第49種，1959），頁1。

²⁹ 謝金鑾、鄭兼才纂，薛志亮修，《續修臺灣縣志》，頁260-261。

奴才抵任以來，取閱地圖及至親歷各處細察，南路山豬毛之地勢，山徑叢雜，庄社荒僻，居民零落。隨再會商臺灣道臣張棟、臺灣府知府蔣元樞，復於險要處所，添蓋望樓，俾聲勢聯絡，庄民、熟番共相守禦。³⁰

文中提到董果任臺灣總兵，曾「取閱地圖」以瞭解臺灣南路山豬毛的形勢，此種地圖應與本圖類似，即與兵防、武備有關，作為總兵出巡時的參考依據。由於當時董果剛到臺任職數月，這幅圖應非其繪製，而是清朝統治臺灣期間治臺官員均曾繪製此種武備圖，在任時使用，亦留與接任者，故董果謂是「取閱」地圖。1783年（乾隆 48 年）閩浙總督富勒渾在一份奏摺中報告臺灣班兵添設情形時，亦提到「臣謹按輿圖，酌核營制」，³¹ 此種記載營制的地圖亦是臺灣武備圖。

歷任臺灣總兵持有與使用武備圖，應是其職責所需，但未必每一任總兵都會依據舊的地圖，加上新的地理訊息，重新繪製一幅新的地圖。但在董果的傳記資料中卻可發現其曾繪製臺灣地圖。董果為直隸豐潤（今河北省唐山市）人，1891年（光緒 17 年）刊本《豐潤縣志》有其傳記，謂：

董果，字毅千，董各莊人。乾隆辛巳武進士，授三等侍衛，出為甘肅遊府，剿巨盜馬得鼈，微服至其巢，計擒之……。繼隨大將軍阿桂征大金川索諾木，攻破羅博瓦山梁色彭普諸砦，進據險要，直搗噶喇賊穴，前後七十餘戰，人以楊無敵比之。金川既平，擢建甯鎮總戎，陞見，膺懋賞。調閩省漳州鎮總戎。純廟以臺灣為閩重地，華夷雜居，非威望素著者不能綏柔而震懾之，特簡果為臺灣掛印總戎，果巡視四境，繪圖指示將士，使明地勢要害、戰守機宜，海疆倚為長，其圖今尚存焉。³²

董果是武進士出身，戰功彪炳，任職臺灣總兵時，曾巡視四境，「繪圖指示將士」，且方志作者謂本圖於光緒年間尚存，亦即百餘年前董果之地圖尚存於世。現代董果家鄉的文史學者謂董果「曾手繪臺灣全境圖及軍事要塞圖，一直保存于董氏祠

³⁰ 臺灣鎮總兵官董果，〈為奏巡視臺灣情形事〉，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40 冊，頁 641-642。

³¹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55 冊，頁 104-106。

³² 郝增祜等纂修、周晉堃續纂修，《光緒豐潤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 345-346。

堂」，文化大革命時「被抄，不知去向」。³³ 至於本文討論之圖，其館藏編號為 Add. MS. 16363 (D)。大英圖書館的前身大英博物館於 1867 年創立東方手稿部時，將先前收入之地圖均編為 Add.。至於 MS. 16363 (D) 則是 1846 年大英博物館購自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之地圖；而馬儒翰逝世於 1843 年，故本圖早於 1843 年已外流於市，後歸馬儒翰收藏。因此，本圖必非前述方志作者所見之圖，但也許是董果地圖的不同繪本。

此外，至今尚存兩幅地圖與本圖有關，一幅是日本天理大學收藏的乾隆中葉臺灣輿圖，蘇峯楠曾指出其內容與本圖類似，如臺灣縣與諸羅縣交界處的紅線番界畫與本圖類似，而與〈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以下簡稱「〈紫線圖〉」)不同。³⁴ 這是一項值得重視的發現。天理大學之圖繪製較精美，但內容文字則不如本圖詳細，不過兩者有關汛塘標注文字的格式與內容相當雷同，反映同時期之軍事地理訊息，且有相同的資料來源。但是天理大學之圖將番界誤繪為道路線，繪者可能不解臺灣事情，而是依循某種類似本文所論之圖抄繪，且部分誤繪。

至於 2017 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重刊的〈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以下簡稱「〈侯氏圖〉」)，在鳳山縣區域亦繪製土牛與關隘，蘇峯楠認為本圖強調「鳳山縣沿山邊界隘寮、土牛與竹圍的增補，文字題寫、線條描勒、設色亦工整精緻，與〈民番界址圖〉、〈紫線圖〉的稿本形式不同，說明〈侯氏圖〉不是稿本，而可能是一幅成品」，認為或許是由當時驗收工程的臺灣道俞成、臺灣總兵董果製作，上呈閩浙總督富勒渾參閱之圖。³⁵ 但這只是推測之辭，並無實證。筆者認為〈侯氏圖〉雖然在鳳山縣繪製土牛與十座關隘，顯示 1780 年代新的地理訊息，但鳳山縣之番界均繪成河道，並非真實情況，且與鳳山縣各河道匯合或交叉也不自然，此種描繪方式比較像前述天理大學之圖，應係繪者不解臺灣情形抄繪時誤繪，似非臺灣總兵上呈總督之圖或所謂「御製」之圖。

綜上所述，依據本圖之繪製特點與敘事思維，筆者認為應稱之為〈臺灣武備

³³ 中共唐山市豐南區委宣傳部、唐山市豐南區文聯編，《文化豐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頁 277-278。

³⁴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38。蘇峯楠曾以〈大英圖書館藏臺灣番界圖的初步考察〉為題，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由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解讀工作坊」報告。

³⁵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37。

圖〉或〈兵防圖〉。年代早約一、二十年的《重修鳳山縣志》將營制資料置於「兵防志」，而同時期《續修臺灣府志》則歸屬「武備志」。府志纂修者解釋設立「武備志」的類目緣由，謂：「國家昇平百年，德威遐播，武備不因修文而廢；凡以固疆圉、輯民人，薄海內外，有備無患矣」。³⁶ 這幅圖展現的便是官員統治臺灣時，「固疆圉」、「輯民人」，有備無患的思維與作法。由於本圖繪製於 1780 年代，故可稱之為〈1780 年代臺灣武備圖〉。此種武備圖之繪製，應與當時臺灣鎮總兵有關，而以 1780 年時的臺灣總兵董果可能性最大。

五、鳳山縣關隘位置的討論

本圖對於鳳山縣關隘與土牛的畫法頗為特殊，如在紅色番界上繪有長方形色塊 39 處，表示該處有土牛設施；而關隘所在亦添加建築物圖示，且標注為「木隘」或「石隘」，其他縣廳關隘並未如此標示，顯示繪圖者重視此區域的描繪，亦是判斷本圖繪製年代的重要依據。但是本圖所載鳳山縣關隘與同時期另一重要文獻，即蔣元樞編纂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有些歧異：

1. 蔣元樞謂有隘寨、通事寨十六座，而本圖僅繪十座關隘。
2. 兩種文獻對於最南方四座關隘名稱記載不同。

由於蔣元樞時任臺灣知府，實際規畫此區域關隘的整建，其所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被認為是政蹟的實錄。故兩種文獻對於上述記載不同的現象頗值得探討。

第一點的差異較易理解，因蔣元樞所繪之〈鼎建傀儡生番隘寨圖〉，共繪關隘 10 座，在各處關隘之東側，分設 6 座「通事寨」，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在稍後的官方文件中，統稱為隘寨十六座。而本圖所繪關隘十座，僅指關隘而言，未包含通事寨。繪製年代稍後的〈侯氏圖〉、〈紫線圖〉亦均未繪製通事寨。

這種現象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通事寨仍然存在，只是重要性不高，前述幾種圖未描繪，另一可能性是通事寨名存實亡。由於史料有限，難以判斷何者為是。不過筆者認為通事寨僅是「以木為柵」，其建築容易毀壞，且由生番通事攜帶壯

³⁶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367。不過，此段文字其實是援引自《重修臺灣府志》。參見周元文纂修，《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66 種，1960；1718 年原刊），頁 236。

丁守禦，須籌措口糧、薪金，不像其他關隘有官方撥給的田地耕作；而且設置通事寮的目的只是為「與熟番互為聲援」，似乎功效有限，難以持久。

至於前述第二點，即鳳山縣南方四隘的順序，須要較多文字論證，且此事又涉及枋寮隘望樓的存廢，以下各以一小節討論。

（一）南方四隘的順序與位置

1990年代施添福討論屏東平埔人移徙時，曾關注鳳山縣關隘的位置，當時依據的史料主要是蔣元樞編纂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³⁷近年由於〈紫線圖〉、本圖、〈侯氏圖〉重刊於世，引起一些學者撰文討論，特別是蘇峯楠所撰〈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與李文良之〈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筆者在上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上，認為鳳山縣關隘仍存在一些問題值得討論。以下先探討鳳山縣十處關隘的設置。

蔣元樞書中所說鳳山縣舊設六隘，已見於1762年（乾隆27年）編輯之《重修鳳山縣志》，其中二隘亦見於同一時期繪製之〈民番界址圖〉。十餘年後，蔣元樞任臺灣知府時，認為舊設六隘，「所撥之番為數無多，又無隘寮居住」，且今昔情形不同，「前此生番出沒之處，今則番跡罕到；前者從未出沒之區，今則有路可通」，故「於生番出沒之處，添建隘寮，酌移舊隘，添撥番丁連眷同住」。

蔣元樞又謂：

除舊有之糞箕湖、巴陽庄、新東勢等四隘仍照舊址改建外，其山豬毛隘移建於雙溪口、武洛隘移建於加臘埔、枋寮隘移建于毛獅獅，並添建大路關、毒口溪等三隘，共計十座。³⁸

此段文字中，提及鳳山縣關隘的設置，包含三種情形：

1. 在四隘舊址改建：糞箕湖、巴陽庄、新東勢，另有一隘未敘明。
2. 自三隘舊址移建到新址：山豬毛隘移建於雙溪口、武洛隘移建於加臘埔、枋寮隘移建于毛獅獅。

³⁷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頁102-103。

³⁸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30-31。

3. 添建三隘：大路關、毒口溪，另有一隘未敘明。

上述圖說文字有兩點值得探討，一是改、移、添建關隘總數是十處，蔣元樞列舉其中八處隘名，但另有兩處未敘明？而更重要的是舊有關隘六處，若舊址改建有四處，那麼移建的關隘只能有兩處，而不可能是三處，亦即改建、移建之關隘總數不能超過舊有六處關隘。換言之，添建之新隘應非三處，而是四處。顯然此段圖說文字彼此有矛盾處？

除了圖說之外，蔣元樞在〈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與〈建設鳳邑望樓圖〉中均繪製十處關隘，但兩圖內容不大一樣。前者標注各處隘名，並描繪各隘形狀與圍牆材質：各隘均為方形，有六處圍牆是灰色，似謂以石砌築，另有四處是棕色，似為木柵。而後者繪有「隘口」六處、「隘綦」四處，「隘口」圖樣似城樓狀，而「隘綦」則是房屋建築，外圍以木柵。根據各隘與河流的相對位置，可斷定〈建設鳳邑望樓圖〉所繪「隘口」、「隘綦」即為蔣元樞建造的十隘，但其圖樣與〈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差異甚大。³⁹ 由於〈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的主題是關隘，故應以該圖所繪為是，但新的問題是該圖所繪各隘順序卻與本文所論之圖略有不同。下表一羅列〈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本圖、〈侯氏圖〉、〈紫線圖〉所載之隘名與順序。

四種文獻所載十隘名稱與順序，有六處相同，即從鳳山縣北側的毒口溪隘至萬巾庄隘，但接下來的四隘，蔣元樞之圖與其他三種文獻的順序不同。不過，〈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與本圖均載關隘圍牆的材質，即石隘或木隘，其順序相同。

南方四隘的歧異有二，一是排列順序不同，蔣氏之圖將毛獅獅隘置於最南；另一不同是蔣氏之圖有加藤埔隘，而無加匏朗隘，本圖則反之。

施添福注意到上述四隘位置的矛盾，他修正蔣元樞著作的說法，認為枋寮口隘是移至埔姜林，而非毛獅獅隘；毛獅獅隘是巴陽隘移建過來。另外，他依照 1830 年代纂修的《福建通志》，省略了加匏朗隘，而在新東勢隘之北新增杜君英隘。⁴⁰

³⁹ 李文良，〈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頁 20 解釋〈建設鳳邑望樓圖〉之隘口與隘察的描繪，認為這兩種名稱，「雖然同樣是防番設施，卻有不同的制度起源」。筆者認為不宜過度解釋這兩種描繪的差異，因為蔣元樞在〈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中對十隘的描繪與該圖並不一致，顯然這類描繪有其任意性。

⁴⁰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例〉，頁 103；陳壽祺總纂、魏敬中重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文叢第 84 種，1960；1835 年原刊），頁 341 載：「杜君英隘（轄上淡社）……四隘俱乾隆間建，以防生番出沒」。

表一 鳳山縣十隘順序比較表

初設六隘	蔣元樞十隘順序	大英圖十隘順序		侯氏圖十隘順序	紫線圖十隘順序
	毒口溪隘	毒口溪隘蔡	石	濁口溪隘蔡	毒口溪隘
武洛隘	加臘埔隘	加臘埔隘蔡	石	加臘埔隘蔡	加臘埔隘
	大路關隘	大路關隘蔡	石	大路關隘蔡	大路關隘
山豬毛隘	雙溪口隘	雙溪口隘蔡	石	雙溪口隘蔡	雙溪口隘
新東勢隘	新東勢隘	新東勢隘蔡	木	新東勢隘蔡	新東勢隘
	萬巾庄隘	萬巾庄隘蔡	木	萬根庄隘蔡	萬巾庄隘
糞箕湖隘	糞箕湖隘	加匏朗隘	木	加走朗隘蔡	加匏朗隘
巴陽隘	埔姜林隘	毛獅獅隘蔡	石	(毛獅獅隘蔡)	毛獅獅隘
	加藤埔隘	糞箕湖隘蔡	木	糞箕湖隘蔡	糞箕湖隘
枋寮口隘	毛獅獅隘	埔姜林隘蔡	石	埔姜林隘蔡	埔姜林隘

資料來源：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30；林天人編撰、謝國興主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頁 305-307；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頁 154、166、178；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 69、75、83。

因此，南方四隘的順序是萬巾隘、糞箕湖隘蔡、毛獅獅隘蔡、埔姜林隘蔡。

蔣元樞記載枋寮（口）隘移建於毛獅獅，有學者依循此一描述，認為毛獅獅隘蔡的位置在鹿場角，今屬屏東縣新埤鄉箕湖村，⁴¹ 位在糞箕湖隘蔡之東南方。但本圖中毛獅獅隘蔡位在糞箕湖隘蔡之北，兩者之間還隔著一條溪流（舊林邊溪河道），故此一位置的比定可能有問題，《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之解讀者亦已指出此點。⁴² 筆者贊同施添福的見解，即枋寮口隘移至埔姜林，而非毛獅獅。不過，施添福省略了加匏朗隘，而新增杜君英隘，此乃據十九世紀之方志記載，與乾隆年間的蔣元樞著作、本圖及〈紫線圖〉不同。

蘇峯楠試圖解釋上述四隘位置歧異的原因，他認為蔣元樞規畫在「埔姜林隘」之南，約今屏東縣枋寮鄉新開、天時、內蔡、隆山等村一帶，設置「毛獅獅隘」與「加藤埔隘」；但後來「毛獅獅隘」被調整到「萬巾庄隘」與「糞箕湖隘」之間，而「加藤埔隘」則不見了，亦即蔣元樞完成初步規畫後，隘蔡又再進行一次

⁴¹ 黃瓊慧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637。

⁴²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 71 之解說未說明其位置，但質疑位於新埤鄉箕湖村鹿場角附近的說法。因鹿場角位於箕湖庄東南，而〈紫線圖〉中，將此隘繪於糞箕湖庄東北。另一點是認為王武勇隘首在契約中是代筆併在場人，而非業主。

調整。⁴³ 換言之，蔣元樞曾在「埔姜林隘」之南，規畫設置兩處關隘，但後來廢棄此種規畫，另於北方新設兩處關隘。

筆者認為蘇峯楠調和本圖與蔣元樞圖冊兩者差異的說法仍有疑慮，應考慮蔣元樞所繪〈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的正確性？前文已提及隘綦圖說關於十隘新建或移建的說法矛盾，隘綦圖中有關南方四隘的描述亦可能有誤。

以下探討南方四隘的位置。

1. 加匏朗隘：

本圖有文字標注「加匏朗隘綦」、「木隘」等，並繪有隘寮圖樣。蔣元樞之〈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說〉未有此隘，但另繪有「加藤埔隘」，疑即加匏朗隘，但位置誤繪在林邊溪南側。

〈紫線圖〉記載：「加匏朗：原設隘綦壹座，內派撥力力社番隘丁貳拾壹名，撥給園地貳拾肆甲捌分，以資守隘口糧。其地俱在隘綦前後左右兩旁界內，應請照番地番耕免其陞科」。⁴⁴ 此隘在今屏東縣萬巒鄉新厝村加匏朗，在東港溪以南，守護此溪出山隘口。

2. 毛獅獅隘：

本圖繪有隘寮圖樣，並標注「毛獅獅隘綦」、「石隘」等，置於「加匏朗隘綦」與「糞箕湖隘綦」之間。蔣元樞〈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說〉載：「枋寮隘移建于毛獅獅」，又〈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繪有「毛獅獅隘」，居各隘最南側，與本圖不同。〈侯氏圖〉在巒隴庄（今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以東繪有一關隘，未載隘名，應即「毛獅獅隘綦」。

〈紫線圖〉載：「毛獅獅：原設隘綦壹座，內派撥茄藤社番隘丁肆拾貳名，撥給園地肆拾陸甲陸分，以資守隘口糧。其地在隘綦後及左右兩旁界內，應請照番地番耕免其陞科」。十九世紀《福建通志臺灣府》記載：「萬巾庄隘（轄力力社）、

⁴³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29-30。他認為枋寮鄉倚臨今屏東縣春日鄉山區，該地區有兩個明顯隘口，一處是內寮溪出山口，即枋寮鄉新開、天時村交界處一帶；一處是北勢溪出山口，即枋寮鄉內寮、隆山村交界處一帶。他推測蔣元樞原先規劃的「加藤埔隘」可能設立於前者，「毛獅獅隘」可能設立於後者。

⁴⁴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 76-77。

吧陽毛獅獅隘（轄茄藤社）、糞箕湖隘，三隘俱為加泵生番出沒之所，乾隆間設防守」。此一文獻似說明吧陽與毛獅獅兩地名有著某種關聯性。⁴⁵

關於此隘的位置，或謂在鹿場角（今屬新埤鄉箕湖村），但該地離糞箕湖隘太近，似非毛獅獅隘位置。本圖對此隘周圍的描繪相當簡略，但可判斷此隘在放線港（林邊溪）以北，其位置與〈紫線圖〉所繪不同。據後者之描繪，毛獅獅隘位在庇興溪（今林邊溪萬河道）以南，東岸庄（今屏東縣潮州鎮東岸舊庄）以東，巒隴庄東北，而巴陽庄（今址不詳）在庇興溪以北。〈侯氏圖〉之描繪與之相近，此隘繪於「鹿興溪」之南，巒隴庄東側。

「庇興溪」與「鹿興溪」兩名稱，不知何者為是，可能稱為「鹿興溪」，因為庇字較有可能為鹿字之訛誤。〈侯氏圖〉之解讀者認為此溪今址不詳。⁴⁶ 筆者認為此溪應即今之林邊溪，其河道與今日不同，因為在〈紫線圖〉中，鹿興溪南有東岸庄、北有崙仔頂庄（今屏東縣潮州鎮崙仔頂），兩庄被溪隔開，但現今兩地均在林邊溪以北。現今林邊溪河道流經東岸庄南側，但當時是由東岸庄北邊經過，而毛獅獅隘在東岸庄東側，當時應在河道之南。毛獅獅隘可能因河道變遷，致原址毀棄。其原址不詳，可能在今潮州鎮、萬巒鄉及新埤鄉交界一帶，鄰近林邊溪出山隘口。

3. 糞箕湖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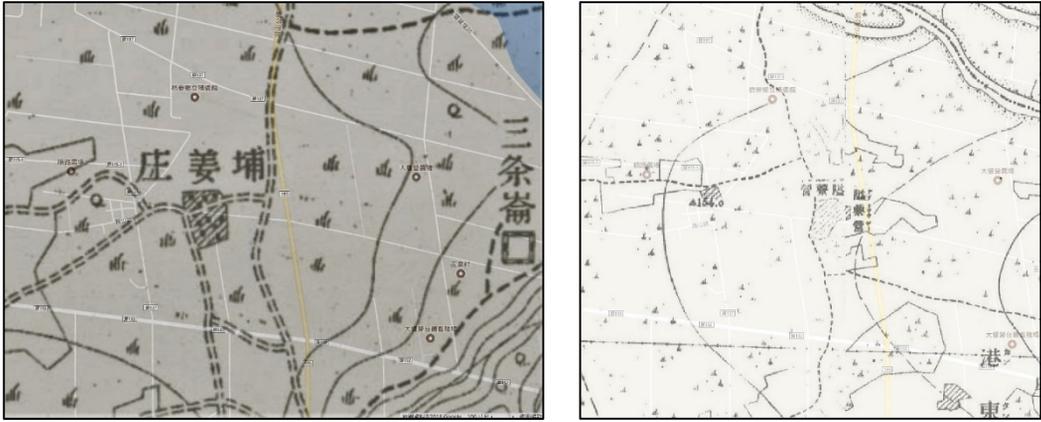
本圖繪有隘寮圖樣，有文字標注「糞箕湖隘寮」、「木隘」等，置於上苦溪與放線港之間，鄰近有大崙鹿塘。〈紫線圖〉載：「糞箕湖原設隘寮壹座，內派撥茄藤社番隘丁貳拾壹名，撥給園地貳拾貳甲陸分，以資守隘口糧。其地俱在隘寮後及左右兩旁界內，應請照番地番耕免其陞科」。蘇峯楠依據〈紫線圖〉及 GIS 定位，推測其位置可能在今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餉潭一帶，把守林邊溪上游從來義鄉山區流出之出入口。⁴⁷ 另一見解是二十世紀初餉潭庄熟番有 751 人，遠多於鄰庄，可為佐證。⁴⁸ 由於日治初期之餉潭庄管轄餉潭、下獅頭等聚落，筆者認為此

⁴⁵ 陳壽祺總纂、魏敬中重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524。

⁴⁶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17），頁 172。

⁴⁷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29。

⁴⁸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頁 173。



圖五 日治初期地圖中的埔姜林

資料來源：左側為 1895 年 10 月 11 日日軍繪製之〈第二師團枋寮附近上陸當夜之位置圖〉；右側為 1905 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測繪之《臺灣堡圖》，圖層堆疊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下載日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隘位在糞箕湖庄之東側近山處，但未必即是餉潭村的餉潭，亦可能在同村之獅頭或鹿場角。

4. 埔姜林隘：

本圖繪有隘寮圖樣，並有文字標注「埔姜林隘寮」、「石隘」等，置於上苦溪與下苦溪之間。〈紫線圖〉載：「埔姜林：原設隘寮一座，派撥放練社番隘丁肆拾貳名，撥給園地肆拾柒甲貳分，以資守隘口糧。其地俱在隘寮後及左右兩旁界內，應請照番地番耕，免其陞科」。該圖解讀者推測埔姜林位於枋寮鄉太原村。⁴⁹ 施添福謂在「大餉營庄埔羌林（洪水流失）」，但未說明其依據。⁵⁰ 蘇峯楠謂今地名不存，他推測其位置可能在今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青山一帶，此隘乃把守力力溪之出山口。⁵¹ 按在 1895 年（明治 28 年）10 月日本人繪製的地圖中，石公徑新庄（今屏東縣佳冬鄉石光見）東方有「埔姜庄」，更東側有三條崙口（在今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此一埔姜庄應即清代之埔姜林，約在今枋寮鄉玉泉村鄉道 132

⁴⁹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 71。

⁵⁰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頁 90。

⁵¹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29。

與 185 交叉口之西北側；而 1905 年（明治 38 年）繪製之《臺灣堡圖》中，此一區域有一聚落「隘藔營」，恰位於埔姜庄的東側，應為埔姜林隘所在。

綜上所述，蔣元樞對鳳山縣隘寮移建、添建的數字有誤，鳳山縣南方四隘的順序亦有誤。依其說法，若將枋寮隘移建於毛獅獅，等於是原由放練社把守之隘在移建後，改由茄藤社進入放練社的地域把守；而在今枋寮鄉東側沿山一帶，即林邊溪（力力溪）以南、率芒溪（舊稱下苦溪）以北，將出現三處關隘，即埔姜林隘、加藤埔隘、毛獅獅隘。

但〈鼎建傀儡生番隘藔圖〉與〈建設鳳邑望樓圖〉兩圖中，均僅在放練溪以南繪出一或兩隘，其中一處應是糞箕湖隘，另一處是埔姜林隘。換言之，僅以蔣元樞所繪之上述兩幅圖而論，今枋寮鄉沿山一帶並未出現三處關隘。所以，比較可能的情形是蔣元樞所繪〈鼎建傀儡生番隘藔圖〉，在標注隘名時，南方四隘順序有誤，而本圖所載正確；亦即枋寮隘並未移建於毛獅獅，而是往北移約十公里，另建於埔姜林，仍由放練社把守。

〈紫線圖〉、〈侯氏圖〉所載十隘順序與本圖相同，亦可佐證本圖的正確性。因此，蔣元樞圖說與本圖記載不同，應是《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記載有誤，而非蔣元樞的規畫被他自己或後人調整。因此，蔣元樞圖說中以下一段文字：

除舊有之糞箕湖、巴陽庄、新東勢等四隘仍照舊址改建外，其山豬毛隘移建于雙溪口、武洛隘移建于加臘埔、枋寮隘移建于毛獅獅，並添建大路關、毒口溪等三隘，共計十座。⁵²

應有訛誤，其寫法應為：

除舊有之糞箕湖、巴陽庄、新東勢等三隘仍照舊址改建外，其山豬毛隘移建于雙溪口、武洛隘移建于加臘埔、枋寮隘移建于埔姜林，並添建大路關、毒口溪、萬巾隘、加匏朗等四隘，共計十座。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一書是否可能有錯？1967 年中央圖書館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時，著錄此一圖冊，謂：「清乾隆間臺灣知府蔣元樞進呈

⁵²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30-31。

紙本彩繪」，「進呈」一語似乎暗示此書進呈乾隆皇帝，但筆者在一篇研討會論文中指出此書應是未完成的作品，也許蔣元樞有進呈之心，但無進呈之實；此書大部分的圖與圖說曾以碑銘的形式刊刻，其正確性殆無可疑，但有少部分圖說是有疑問，⁵³ 依本文所論，〈鼎建傀儡生番隘綦圖〉及其圖說亦有訛誤處。

（二）枋寮隘望樓的存廢

鳳山縣南端枋寮隘的存廢是另一個學者關注的議題。李文良在〈紫線圖〉（參見圖六）中看到全圖最南端有一建築物，標注為「枋寮隘望樓」，位在枋寮庄東南邊近山處。由於此隘未如鳳山縣其他各關隘一樣，派撥番丁與田園，他認為這不是當時官方所認定的「隘寮」，並質疑「這座在名稱與形式上很像隘寮卻又明顯不被官方視作隘寮的設施，究竟是什麼」？⁵⁴

枋寮隘最早出現在 1760 年代的文獻中，如中研院所藏〈民番界址圖〉，鳳山縣南端紅線番界起始處繪有一處望樓，文字標注「枋寮隘望樓，南離加咯塘禁界五里，北離糞箕湖隘十里，隔坑一道，撥放練社番十名把守」。同時期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縣境南界圖〉中，枋寮庄上方（東側）近山處有望樓建築一處，⁵⁵ 應即前述之「枋寮隘望樓」。十餘年後，蔣元樞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亦提及「枋寮口」等六隘是鳳山縣最早設立的關隘，但規畫將「枋寮隘移建于毛獅獅」。

枋寮隘，或稱枋寮口隘，其位置應在當時枋寮口街之東側，據《重修鳳山縣志》載：「枋寮口街：在枋寮口，縣東南六十五里。南近瑯嶠、東近傀儡山，軍匠屯集之處」。⁵⁶ 由於〈民番界址圖〉、〈紫線圖〉將此隘繪於枋寮庄南方，在下苦溪之北，有學者認為此溪可能即今之士文溪（率芒溪），而枋寮隘在今士文溪谷口。⁵⁷ 不過根據此隘與加洛堂、糞箕湖隘的相對距離來看，枋寮隘應在枋寮鄉

⁵³ 陳宗仁，〈畫錯的與沒畫的圖：關於《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繪製〉，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季風亞洲與東西文明交流工作坊 III」（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教育館 225 室，2014 年 12 月 17 日）。

⁵⁴ 李文良，〈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頁 5-6。

⁵⁵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7。

⁵⁶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32。

⁵⁷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頁 181。



圖六 〈紫線圖〉枋寮地區局部

資料來源：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 69。

北勢溪北方，若將此隘置於土文溪北側，則離加洛堂太近，而離糞箕湖太遠。

若依照蔣元樞的規畫，枋寮隘業已移建，那麼為何〈紫線圖〉與〈侯氏圖〉尚可見到「枋寮隘」之描繪？後者在該區域以中文字標注「枋寮隘」、「枋寮隘望按〔應為樓字之誤〕，南離加洛堂禁界五里，北離糞箕湖隘十里，隔坑一道，撥放線社番十名把守」。

一座移除的隘寮尚出現於 1780 年代兩幅地圖裡，確實是一個可疑的現象。〈紫

線圖)還有另一個疑點,即新設的毛獅獅隘係派撥茄藤社番隘丁 42 名守隘,若照蔣元樞所寫,枋寮隘移建至毛獅獅隘,李文良因而質疑原來駐守枋寮隘的放練社番為何沒有隨著枋寮隘移轉至毛獅獅?他提出的解釋是,「原來的『枋寮隘』實際上還是存在,仍然需要有人防守,放練社依然控制著枋寮隘鄰近的土地」,他更進而推想,可能「茄藤社番早在此之前已經在毛獅獅地方拓墾活動了。所以,新建的毛獅獅隘及其周邊土地,不可能讓南邊新來的放練社控制」。⁵⁸ 此說如果成立,那麼〈紫線圖〉中突兀的枋寮隘望樓,便有其存在的理由了。

不過,本圖的出現提供另一種可能的解釋。首先,如上文有關鳳山縣南方四隘的討論,蔣元樞的圖像描繪與文字敘述是有疑問的,筆者認為枋寮隘並沒有如其所說,移建於毛獅獅隘,而是移建於鄰近的埔姜林。因此,沒有駐守枋寮隘的放練社番為何不移轉至毛獅獅的問題。枋寮隘移建埔姜林隘後,官方撥給放練社隘丁額是 42 名,在鳳山八社中,僅次於阿猴社。

其次,枋寮隘在移建之後是否繼續存在?李文良前述論文認為有此可能性,〈侯氏圖〉亦描繪了「枋寮隘」圖像,彷彿此隘仍然存在。但〈侯氏圖〉的說明文字與〈民番界址圖〉相比,除了錯字(樓字)、地名異寫(加洛堂)外,其文句、里程基本相同,因此應考慮〈紫線圖〉與〈侯氏圖〉對「枋寮隘」的描繪是抄襲自更早期的地圖,如〈民番界址圖〉。但在 1780 年代,距離枋寮隘(如真實存在的話)最近的應是埔姜林隘,而非糞箕湖隘,枋寮隘「北離糞箕湖隘十里」的描述正可說明〈侯氏圖〉有關「枋寮隘」的描繪是沿襲先前地圖的寫法,而非現實的陳述。因此,〈紫線圖〉與〈侯氏圖〉中的「枋寮隘」圖像應是一歷史殘跡,遺留於後來的地圖中。本文所論之圖未描繪枋寮隘,反而才是當時真實情況的反映。

六、結論

現代人觀看古地圖時常有一種驚奇的感覺,時空的差異,使我們在熟悉的土地上看到陌生的景觀、線條及文字標注。當我們想要問某張古地圖為何如此畫

⁵⁸ 李文良,〈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頁 7-9。

時，常發現古地圖與其當年繪製的時空脈絡已斷了連繫，如同本文探討大英圖書館收藏的此幅臺灣地圖，我們只知十九世紀英國向傳教士馬儒翰收購一批地圖，本圖也是其中之一，馬儒翰如何取得本圖則不詳，甚至也有可能是他父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留給他的。總之，我們對於古地圖的研究，通常都缺乏直接相關的史料，只能依據地圖本身的訊息，如圖像、文字及材質等，重構地圖繪製的背景。

本文分析本圖的圖像描繪及文字注記，認為本圖有兩個特點，一是著重臺灣府各級軍事據點的描繪與說明，如遍布臺灣府各地的營、汛、塘或巡檢司，以及關隘、望樓（望堃）等，還有汛塘彼此間的道路線連繫；文字標注也是說明上述據點的員額、里途等資料，不僅呈現官方的地理訊息，而且反映武職官員的需求與思維，整幅圖敘述的是系統性、全面性的臺灣武備規畫。本圖另一特點是較重視鳳山縣關隘與土牛的描繪。

關於本圖的繪製時間，本文依據鳳山縣關隘與土牛整建工程的完成年代，認為繪圖時間應在 1780 年或稍後。至於繪圖者，本文認為與臺灣的武職官員有關，李孝聰、林天人等學者均已注意到本圖偏重軍事布防情形；由於此種武備圖之繪製應與當時臺灣鎮總兵有關，筆者認為以 1780 年時的臺灣總兵董果可能性最大，因為鳳山縣的關隘與土牛整建亦是在他擔任臺灣鎮總兵任內完成，而且他曾繪製臺灣地圖，留傳後世。至於本圖未載圖題，先前學者稱其為〈臺灣前山圖〉或〈臺灣汛塘望堃圖〉，本文分析本圖繪製特點與繪圖思維，認為本圖屬武備圖，應稱為臺灣武備圖，由於繪製於 1780 年代，故可稱之為〈1780 年代臺灣武備圖〉。

從現在的角度看，1780 年代可謂是臺灣地圖史上的熱鬧年代，先有臺灣知府蔣元樞纂修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1781 年他在福建過世時，此一圖說可能尚未完成。本文所論之圖大約完成於 1780 年或稍後，而〈侯氏圖〉、〈紫線圖〉亦先後完成於 1780 年代。上文討論的天理大學之圖亦屬此一時期之地圖。這些地圖有一共同點，即均描繪臺灣南北各地的關隘，而且除了天理大學之圖缺鳳山縣的圖幅外，其他四種地圖均著重描寫鳳山縣的關隘。1780 年代鳳山縣增設隘堃與土牛應是當時臺灣官場盛事，故受到上述繪圖者的重視。

現代學者亦重視上述地圖資料，藉以探討鳳山縣的關隘與地域社會的關係。

但上述地圖在某些局部有矛盾的現象，如蔣元樞對鳳山縣南方四隘順序描繪與其他圖不同，筆者認為應是蔣元樞所記有誤，不宜以規畫生變的角度再作推論。某些地圖在鳳山縣最南端描繪枋寮隘，但本文認為這應是先前地圖的殘餘，而非真實存在於 1780 年代。

總之，如何看待大英圖書館收藏的這幅地圖？1777 年 5 月福建漳州鎮總兵董果奉調為臺灣鎮總兵，他在謝恩摺中謂：「臺灣一鎮，民番雜處，內則崇山峻嶺，宵小易於潛蹤；外則汪洋大海，鯨鯢每多匿跡」，⁵⁹ 這段話其實與 1769 年新任臺灣鎮總兵葉相德的謝恩摺文字雷同；⁶⁰ 換言之，這大概是幕僚間相互抄襲的官場套語，但這種套語正反映了當時官員對於臺灣的看法，如「民番雜處」、「宵小潛蹤」。官員要如何治理臺灣？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展現的，正是清朝官員治理此一海疆重鎮的思維與手法，即透過營、汛、塘、巡檢到基層的關隘、望樓，建構系統性、全面性的軍事部署。但我們也要注意完善軍事部署背後的虛構性，⁶¹ 因為本圖繪製於 1780 年代初，但 1782 年臺灣中、北部發生械鬥，1786 年後出現更大的動亂（林爽文事件），臺灣鎮總兵無力面對，說明這幅地圖呈現的只是紙面上的統治，經不起現實社會的衝撞。

⁵⁹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38 冊，頁 339。

⁶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33 冊，頁 110 載 1769 年 1 月 31 日（乾隆 33 年 12 月 24 日）福建漳州鎮總兵葉相德謝恩摺，其文謂：「惟查臺灣一鎮民番並處，內則崇山峻嶺，外則大海汪洋，宵小既易潛蹤，鯨鯢無難匿跡，防範稍疏，每致滋事」。

⁶¹ 筆者在 2016 年 8 月在中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辦之「古地圖中的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報告此篇論文時，曾提出「完善軍事部署的虛構性」、「紙面上的統治」等概念。

引用書目

-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下載日期：2017年12月20日，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 中共唐山市豐南區委宣傳部、唐山市豐南區文聯（編）
2012 《文化豐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2002 《乾隆帝起居注》，第30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
2009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63-64、66冊。北京：九州出版社。
- 王瑛曾（纂修）
1962[1764] 《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余文儀（纂修）
1962[1774] 《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李文良
2017 〈清乾隆年間南臺灣的邊防整備與社會發展〉，《國史館館刊》（臺北）52：1-32。
- 李孝聰
1996 《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杜正勝
2003 《臺灣民番界址圖說略》。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周元文（纂修）
1960[1718] 《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林天人（編撰）、謝國興（主編）
2015 《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文化中心。
-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
2015 《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東溟奏稿》，臺灣文獻叢刊第4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施添福
2001 〈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頁33-11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郝增祐等（纂修）、周晉堃（續纂修）
2006 《光緒豐潤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82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3、38、40、42、55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許雪姬

1987 《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志豪

2017 〈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24(4): 1-33。

陳宗仁

2014 〈畫錯的與沒畫的圖：關於《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繪製〉，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季風亞洲與東亞文明交流工作坊 III」。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教育館 225 室，12 月 17 日。

2015 〈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22(2): 1-44。

2016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內容解析〉，收於華林甫、陸文寶主編，《清史地理研究：第二集》，頁 305-3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壽祺（總纂）、魏敬中（重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0[1835] 《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項 潔（主編）

2005 《國立臺灣大學典藏古碑拓本·臺灣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黃瓊慧等（撰述）

2001 《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

2017 《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3 《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 1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6 《臺灣兵備手抄》，臺灣文獻叢刊第 22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良璧（纂修）

1961[174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良璧（纂修）、楊永彬（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5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

1983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謝金鑾、鄭兼才（纂），薛志亮（修）

1962[1807] 《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蘇峯楠

2015 〈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22(3): 1-50。

Mapping a Marine Frontier: Taiwan Map of Qianlong Era Stored at British Library

Tsung-jen Chen

ABSTRACT

The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contains a spectacular map of Qing Taiwan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It is in color and spans approximately 490 cm in length. From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feature that warrants the most attention in this cartographic depiction of Taiwan is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borderlines (番界, *fanjie*). Moreover, this map sketches also both imperial and unofficial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raffic routes, governmental offices, military posts (汛塘, *xuntang*), frontier inspection stations (關隘, *guanai*), local watchtowers (望樓, *wanglou*), aboriginal villages (番社, *fanshe*), as well as Han towns and settlements.

This map of Qianlong era has neither captions nor textual descriptions, thus requiring a more thorough reconstruction of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mportant themes, the main initiator and his chief inten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tion. In view of the specific watchtower depictions, which reflect changes taking place between 1778 and 1780, the map was drawn around or after 1780. Furthermore, this map is probably also related to General Dong Guo (董果), who at that time was in charge of the Taiwan garrison.

Taiwan subsequently emerged as a crucial part of Qing empire's southern frontier and central channel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agination of Qing official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is Taiwan map of Qianlong era stored at the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 sheds light on the attitudes of Qing dynasty officials regarding the marine frontier.

Keywords: Map of Taiwan, Green Standard Army, Fengshan County, *Tu-niu* Ditch, Frontier Inspection Station